

晚清民国教育家王亨彦乡土教育中的家国情怀及其当代价值

潘舒婷¹, 邵晓敏¹, 李响¹, 李伟强^{1*}

(¹ 浙江海洋大学 师范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要: 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与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交织的背景下, “爱国必自爱乡始”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教育理念, 乡土教育成为培育国民意识、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途径。浙江定海地处海防前沿, 是舟山群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屡遭海禁与战争, 其乡土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1906年, 定海人王亨彦编纂《定海乡土教科书》, 将家国情怀融入蒙学教育。他通过记述历史忧患与乡土命运唤醒家国情怀, 以“针砭时弊”传递经世致用的改良思想, 构想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建设, 主张捍卫海疆主权。该书实现了由“爱乡”到“爱国”的情感升华, 既是清末乡土教育的典型实践, 也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 with 乡土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王亨彦; 《定海乡土教科书》; 乡土教育; 家国情怀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5.1504>

Wang Hengyan's Local Education and Family-State Sentiment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Pan Shuting¹, Shao Xiaomin¹, Li Xiang¹, Li Weiqiang^{1*}

(¹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Teacher college, Zhoushan, Zhejiang, 316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twined late Qing New Policy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an unprecedentedly grave national crisis, "patriotism begins with love for one's native place" emerged as a widely shar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Native-place education became a vital venue for cultivating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arousing patriotic sentiment. Located on the frontline of coastal defense, Dinghai in Zhejiang served as the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of the Zhoushan Archipelago. Having repeatedly endured maritime prohibitions and warfare, its native-place education was intimately bound to the nation's destiny. In 1906, Wang Hengyan, a native of Dinghai, compiled the Dinghai Native-Place Textbook, integrating family-state sentiment into elementary instruction. By chronicling historical tribulations and

基金项目: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千岛海韵, 乡土悠长——舟山乡土教科书编纂与乡土知识教育及推广策略研究(2025R411A031); 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黄以周《易》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2025B017); 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人工智能与海洋文献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研究”(2024121369458)

作者简介: 潘舒婷(2005-), 女, 浙江温州,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

邵晓敏(2005-), 女, 浙江温州,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

李响(2005-), 女, 浙江温州,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

李伟强(1993-), 男, 浙江嘉善,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

通讯作者: 李伟强(1993-), 通讯邮箱: liweiqiang1993@163.com

the fate of his native place, he awakened family-state sentiment; through critiquing contemporary maladies, he conveyed reformist ideals of practical statecraft. He envision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while advocating the defense of maritime sovereignty. The book achieved an emotional sublimation from native-place attachment to national patriotism, representing both a paradigmatic practice of late Qing native-place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native-plac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Wang Hengyan; Dinghai Native-Place Textbook; Native-place education; Family-state sentiment

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在此背景下,“爱国必自爱乡始”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教育理念。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堂之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尤当先讲乡土历史”,旨在由近及远,“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进而“动其希贤慕善之心”,最终“以养成其爱国之心”^[1]。1905年,学部采纳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并通飭各省编纂乡土志,为各地编纂乡土教材提供了具体的内容框架和范例,在全国掀起了编纂乡土志(乡土教材)的高潮^[2]。定海“孤峙海外”,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边缘而又前沿的地理位置,使其乡土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这也是定海本土士人王亨彦开展乡土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与情感底色。

王亨彦身受传统儒学教育,又亲历晚清变局,1905年科举废除后,他将家塾改为“养正私小学堂”,在家乡马岙开办私塾十余年。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一生致力于定海乡土事业之发展。为解决“《本厅志》详于述古,略于证今,每次演讲多违事实”的教学困境,他利用1906年暑假,仿照《乡土志例目》,以“汰旧志,益近事”为原则,历时两个月编纂完成《定海乡土教科书》,并于1907年3月由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出版该书。这部教科书是定海历史上第一部乡土教材,其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家国情怀。王亨彦在“例言”中明确指出,编纂此教科书的目的是“是以课学者或易兴起,其爱土地,爱国家之思想也欤”,这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纲领。他强调经世致用,“兴建之有关公益者,书以表襮之;敝俗之宜知惩警者,书以讽规之”;注重实证与求真,“物产必实其有无,古迹必区其真伪”。今有定海王氏后人王立先生着手搜集其生平资料,然学界对王亨彦乡土教育思想迄无专门探讨。本文拟据《定海乡土教科书》,探讨王亨彦乡土教育中之家国情怀与当代价值。

1 历史忧患与乡土命运:以“海疆弃地”记忆唤醒家国情怀

王亨彦在《定海乡土教科书》的例言中明确指出,编纂此书是为了“兴起其爱土地、爱国家之思想”。而乡土教育的情感基础,始于对家乡历史的认知。在第一章“历史”中,通过“唐虞至隋”“唐至宋”“元明至国初”“国初至今”四课系统梳理定海从上古至民国的历史变迁,反映出定海屡经置废、屡遭迁徙的坎坷命运。王亨彦将乡土史与国家史相贯通,意在以史警世,唤醒学童的历史忧患意识与家国认同感,是清末“爱国必自爱乡始”乡土教育理念的典型体现。

定海从唐始设县、宋置昌国、元升为州,到明清两次被朝廷强制迁民、废县弃地,沦为荒墟近三百年,清晰呈现出海岛地区随国家政策与政局动荡而反复兴衰的坎坷历史。明洪武年间,“十九年,起遣县民入内地。二十年,县废,徙卫于象山,以其地置中中、中左二所,隶于象山。二十五年,又改隶定海(故镇海),自是邱邑荒芜,为盗贼藪^[3]。”至清初,“我朝顺治八年,浙闽总督陈锦等攻平之,旋为郑成功所围,至十三年,宁海大将军伊尔德始取其地,又奏遣民人徙

于内^[3]。”对于这段长达三百年的荒废史，王亨彦感叹：“合前后计之，定海之为弃地者，几三百年。”国家统一、海防稳固，则定海置县安民；国家海禁严苛、内外动荡，则定海被弃、民众迁徙。王亨彦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深刻反映了乡土兴衰系于国运的家国关系。

此外，书中不回避鸦片战争两度沦陷的事实。

后至道光二十年，英兵陷定海。二十一年，兵退城复，钦差裕谦奏请升县为厅，以同知莅之，始不辖于宁波，而直隶浙省，更为之添城堡，增守兵，屹然为东南重镇。二十二年，又遭英兵之陷^[3]。

定海作为鸦片战争的最早战场，两次被英军攻破，其城郭、衙署、学宫均“叠遭兵燹，堂宇尽燬”。在“城郭”“衙署”等课中，王亨彦记录各处机构的“移建”，并推测“殆因遭英兵之陷，而迄其后也”，使乡土景观本身变为教材，当学子经过这些“遗址”时能够想起它们曾经遭受的磨难。同时，“始不辖于宁波，而直隶浙省”，通过记述战后定海升厅、强化海防的过程，将地方历史与国家危亡、国防安全紧密结合，本质是以乡土经历教育孩童：知乡之难，方知国之弱；念乡之幸，方知国之安。

王亨彦于第四课文末慨叹：“籍于其地者，士读农耕，商迁工作，相安已二百四十余年，较之前代废置无常，身遭遣徙之惨者，何其幸欤^[3]！”乡土之安，全系于国家之固；民生之幸，必本于边防之稳。王亨彦让学生在知乡史、感乡难的过程中涵养忧患意识，培植爱乡报国的初心。这种由近及远、由乡及国的历史忧患意识，是王亨彦乡土教育中家国情怀的第一重表达。

2 经世致用与乡土改良：以“针砭时弊”实践家国责任

作为一位深受儒学经世思想影响，且亲历近代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王亨彦的家国情怀体现为他对乡土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改良实践。在《定海乡土教科书》中，他犀利地从不同角度揭露社会弊病并提出对策，希望以此培养学生成为有担当、能任事的未来国民。

王亨彦对定海的社会风俗持有一种批判性审视的态度。在第十一、十二课《风俗》中，他既肯定了定海“瘠土之民，大都劳而能思，啬而能俭者多”的美德，又对正在蔓延的奢靡与迷信之风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指出城内妇女“有不习针黹，而以擣蒲为消遣者，衣履簪珥，竞趋靡丽”，并明确断言“此风殆不可长也”。对于乡间各庄大兴“赛会”，“僱梨园以演戏”乃至“昇东嶽木像出外游行”的习俗，他详细记述其“金鼓喧阗，观者塞路”的盛况后，笔锋一转，指出其费“较演戏尤糜费”，并援引元代赵天麟欲罢东嶽庙会、清代陆清猷欲禁演剧的古训，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批判立场。当记述洞岙黄杨尖仙台、纯阳二寺每年四、八月十日“礼佛领牒者趋之若蚁”时，他更是痛心疾首道：“乡愚迷信，真不易破。”这种对愚昧习俗的批评，意在教导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世界观，远离迷信，将宝贵的人力、财力用于更有意义的事业上，从而将乡土社会改造为能够孕育现代国民的健康土壤^[3]。

在物质生产层面，王亨彦展现出鲜明的实业救国思想。他对定海经济“利源外溢”的现象深感痛惜。在第十四课介绍水产品时，他惋惜地指出：“惜网捕之法，未尽讲究。入海而渔者，多温、台、奉、象之民，捕带鱼又专让闽人。”第十五课讲到本土制造，他直言“制造土物，多未改良，欲适文明之用，赖开实业学堂以提倡之”。第二十二课谈及城内繁盛街市，他又不忘点醒：“惜著名铺户，多营自外来商人，此亦利源外溢之一端也。”在第十五课，他更进一步将问题提升到工业制造的层面：“制造土物，多未改良，欲适文明之用，赖开实业学堂以提倡之”。在发现以上弊端的同时，王亨彦也在积极地探求解决之道。针对粮食常需外部接济的窘境，他提出“能禁种酿酒之秫稻，可望足食”的具体经济利益权衡；看到洞岙村广植罌粟这一有害经济作物，他坚决地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是宜禁绝之”；而听闻厅同知杨志濂推广蚕桑之举，他则寄予厚望，称“能如法种育，定可获利”^[3]。从渔业技术到蚕桑推广，从抵制鸦片到限制酿酒，王亨彦的教学始终贯穿着一条“民生”主线，将改良生产技术、挽回民族利权等宏大命题，转化为与家

乡具体物产相关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乡土之弊,探寻改良之路。

除了经济和风俗,王亨彦还将社会改良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至社会伦理层面。在第十课“氏族、户口”中,他记述了“马岙林氏,有兄毙弟而焚之者”和“大展张氏,有劫夺富宗者”两起族内恶性事件,并一针见血地将其归因于“团体之不讲也”。在西方物竞天择、群学思想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他将传统宗族内部的伦理失序提升到“团体精神”缺失的高度来反思,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批判。在第五十三课“六横”中,他还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兴之际,“增生王黼清等,率民团歼之,毙贼无算”的乡民自卫事迹^[3]。他用一正一反两个案例,诠释了“团体”涣散则祸起萧墙、团结则足以御侮的道理。通过这种寓论断于叙事的教学方式,王亨彦将保种、保乡、保国的时代主题内化为孩童也可以理解的乡土故事,潜移默化地培育他们的乡土伦理观。

综观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王亨彦的乡土教育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典籍传授,而是将“乡土”本身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审视、被理解、被改造的对象。这种立足现实、针砭时弊、谋求改良的经世精神,同样贯穿于其参与编写的民国《定海县志》之中。书中明确提出,方志之作意在彰往开来,古为今用,反对旧志牵于成例、详略失当、附会穿凿的弊端,重点记载地理、赋税、民生、教化、等关乎地方治理与百姓生计的核心内容,以历史经验服务现实兴革^[4]。县志编纂与乡土教科书编纂形成双向呼应,共同构成近代定海以实证精神审视乡土、以改良实践担当家国责任的社会思潮。

3 现代性视野与家国愿景:以“未来想象”勾画强国蓝图

除了关注过去和当下的历史忧患与经世改良之法,王亨彦乡土教育的超前之处还体现为他的现代性视野。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构想以及对主权的维护意识上。

作为悬居海中的群岛,交通不便是制约舟山发展的最大因素。王亨彦在第十六课“交通”中,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定海悬居海中,往来动由航路”,虽然至上海、宁波已有轮船,但内部诸岛之间,“船皆用帆,或阻风潮,不能自由,旅行者多病之”。他以岱山、长涂等地为例,描述山岭崎岖、陆路艰险,“非有要举,相戒裹足”的困境。面对此种局面,王亨彦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设想:“能于其间,开通铁道,济渡轮舟,既可获利,又普公益,是亦宜研究之问题也。”在一个汽车尚未普及、铁路在中国尚属稀罕之物的时代,在一个舟车难通的悬海小岛,一个乡间塾师能在教科书中畅想“开通铁道”和“济渡轮舟”,这是非常惊人的远见。他看到了交通网络对于整合区域、促进经济、沟通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铁路强国”“交通救国”的思想是相通的。同时,对于信息传递的滞后,他也提出了不满:“至灵通消息,莫如电线……遇有紧要,耽误良多。”^[3]

除此之外,书中展现的近代主权意识也是其思想先进的体现。在第六十六课后的“附说”中,王亨彦特别关注到那些散布在外洋的悬山。他警告说,这些地方“地不升科,亦无租税,任岛民自为栖止,官吏不尽过问,久之恐外人覬觐”。他提到“花脑之售与洋商,致启交涉”,并急切呼吁:“有地方之责者,急宜派员履勘,劝岛民或按则升科,或量输租税,庶官为管辖,绝外人之窥伺,保领海之主权。”这种将行政管理覆盖至边远海岛、通过征收赋税来宣示和巩固主权的思想,是非常现代的国家治理理念^[3]。它将乡土教育和国民教育中对领土与主权的认知提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使孩子们明白,哪怕是最偏远的“拳石”之地,也是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

从畅想海岛铁路,再到疾呼保岛护权,王亨彦的乡土教育在精神和实践上是高度统一的。他在审视家乡落后与不足的同时,更以极大的热情为它的未来描绘出一幅值得奋斗的蓝图。这幅蓝图,既是属于定海一乡一邑的地方愿景,更是近代中国向往文明、追求富强之“国家想象”的有机组成部分。

4 从“爱乡”到“爱国”：王亨彦乡土教育的价值逻辑

王亨彦在《定海乡土教科书·例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之编，是为了让学者“或易兴起其爱土地、爱国家之思想也欤”^[3]，表明其乡土教育的核心主旨。他在书中将海岛的乡土历史、地理风貌、人文民俗等内容与国家疆域、海防安危紧密相连，将认同故土、热爱乡邦的情感上升至心系国家、捍卫海疆，呈现出由“爱乡”走向“爱国”的完整价值逻辑。

首先，以历史忧患唤醒学生对乡土命运与国家危亡的意识。王亨彦从舟山定海的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等切入，先引导乡民与学子认识、了解乡土，建立起地方归属感。之后跳出地域局限，将定海海岛命运置于晚清民国国家海疆格局之中，把乡土兴衰与国家存亡紧密绑定。定海“三百年弃地”与“两遭英陷”的惨痛、屈辱使学生认识到，乡土凋敝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积弱。守护乡土就要守护国家，“爱国”“救国”是使乡土摆脱屈辱、自强不息的必然要求。

其次，以经世致用作为爱乡到报国的桥梁。王亨彦既通经学，又明时事^[5]。他指出乡土存在的迷信、奢靡、技术落后、利权外溢等种种弊病^[3]，引导学生将“爱乡”之情转化为了解乡土、改良乡土的具体行动。无论是禁烟、劝桑，还是讲究渔法、创办实业学堂，都是将个人所学用于解决乡土问题，而这就是最具体、最切实的救国行为。这样家国情怀便不再是庙堂之上的高谈阔论，抽象的爱国之志变得具象化。

最后，以现代性视野推动乡土、国家发展。王亨彦强调乡土是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疆安稳与故土存续密不可分。书中通过修筑铁路、开通轮渡、架设电线、管辖悬山以保主权的超前构想，对于国家来说“救亡图存”，对乡土来说拓展想象空间，让学子看到家乡的更多可能。引入现代文明成果之后，乡土能变得交通便利、信息通达，主权巩固。乡土发展也正是整个国家走向文明富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至此，他的定海乡土教育已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启蒙，具备了培育近代国民、筑牢海疆认同的深层时代意义。

5 结语

王亨彦在乡土教育中体现的家国情怀，可从四个层面出发理解：一，在晚清民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王亨彦有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看到海岛乡土命运危机并以撰写乡土教科书的方式记录乡邦历史，寄托安邦守土之志；二，秉持传统经世致用治学精神，立足定海地方与民生实际状况推进乡土改良，让乡土教育服务现实、服务地方社会发展；三，具有现代性教育视野，吸纳近代地理、海防、国民意识等新思想，突破传统教化桎梏，兼具海岛地域特色与近代时代精神；四，以乡土认同涵养国家认同，完成从爱乡到爱国的精神升华，赋予舟山海岛乡土教育独特的海防价值与国民培育价值。

置于当下语境，王亨彦在乡土教育中培育家国情怀的理念仍具有重要借鉴启发价值。

第一，坚持立德树人，在乡土教育中培育家国情怀。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历史课程将家国情怀列为核心素养，强调学生厚植家乡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6]。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也明确要求让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推动爱国主义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7]。学科教学可学习王亨彦“爱国必自爱乡始”的教育路径，以乡土为载体，培养青少年文化自信与家乡认同感。

第二，活化乡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地方及校本课程。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教材〔2023〕2号）提出，地方与校本课程应挖掘地域文化、彰显家国情怀，实现国家课程与地方资源协同育人^[8]。当代教育可深入挖掘舟山海防史、海洋文化、海防遗存等特色资源，学生先学习、认同地方文化，再逐步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文化自信，避免家国情怀教育碎片化、空泛化。

第三, 传承经世致用精神, 培养责任担当与实践创新。应新时代实践育人、总体国家安全观、海疆安全要, 当前中小学教育可立足地方实际, 将乡土教育与乡村振兴、海洋文旅、海疆保护、社会调查相结合, 引导学生在认识家乡、服务家乡中强化责任意识与创新精神, 把爱国情置于具体行动中。

第四, 乡土教育的视野要开放、面向未来。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更要学习王亨彦畅想交通现代化、捍卫领土主权的现代性视野, 引导学生理解家乡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 传承海防文化、维护国家主权, 增强使命担当的同时紧跟时代发展。

参考文献:

- [1] 璩鑫圭、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2] 刘思文. 《乡土志例目》对清末民国方志之影响[J]. 图书馆杂志, 2021, 40(10):142-145.
- [3] 王亨彦. 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M]. 舟山市档案馆影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本.
- [4] 陈训正、马瀛等修. 民国定海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年.
- [5] 王立. 清末王亨彦学术思想初探[J]. 今古文创, 2025(02):73-76.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2022.
- [7] 中共中央、国务院.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意见(教材〔2023〕2号)[EB/OL]. (2023-05-17)[2026-06-0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305/t20230526_1061442.html